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上古音丛论



孙玉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上古音叢論



孙玉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古音丛论/孙玉文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1-25385-4

I. ①上… II. ①孙… III. ①汉语—上古音—研究
IV. ①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6533 号



书 上古音丛论
著作责任者 孙玉文 著
责任编辑 李凌 欧慧英 沈岚 宋立文 孙娴 唐娟华 张弘泓
周鹂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385-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8.75 印张 50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唐作藩

孙玉文教授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即将出版了，嘱我写序，殊感荣幸！

早在今年年初，玉文就将他这部名为《上古音丛论》的文集打印稿交给了我，但今年上半年我正在增订《上古音手册》，后来又去广州开会，会后又应邀到桂林并回湖南先后住了一段时间，所以只能断断续续读玉文的文稿。他这部文集共收录其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研究上古音的论文共12篇。除了论述王力先生“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现实意义作为代前言的1篇，余下分为四卷：卷一“上古音构拟问题”4篇；卷二“联绵字与上古音”3篇；卷三“谐声字与上古音”3篇；卷四“秦汉方言”1篇。总字数近40万，平均每篇有3万字。不仅篇篇份量重，而且质量高。内容涉及上古音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当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些热门话题。可以看出，玉文是专心做了深入的研究，下了很大功夫的，而且都绝非凿空之论，无论是讨论上古音的构拟，还是研究联绵字与上古音或谐声字与上古音以及秦汉方言，无不引证丰富，论说详尽，创获甚多。最突出的，我认为有两条：

第一是对联绵字（词）的研究。传统的古音研究主要是根据形声字和《诗经》、《楚辞》、汉赋及先秦诸子中的韵语用韵。玉文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了古籍中的联绵词以研究上古音。其卷二3篇论文，通过对先秦联绵词（包括双声联绵词、叠韵联绵词、双声兼叠韵联绵词和非双声叠韵联绵词）语音的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探讨了先秦两汉的声母、韵部（包括开合口与四等）、声调系统，揭示了先秦汉语语音的若干特点与重要的语音规律。比如运用历史比较法，推断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与开合四等的不同在上古亦有别，并有其明显的对应规律。其中关于联绵词的声调研究，玉文在其长期深入研究变调构词并取得丰硕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搜集《诗经》《楚辞》及其他先秦古籍中

2 上古音丛论

的共计 724 个联绵词，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统计，发现先秦的联绵词，两个音节之间基本同声调，而且直到中古，联绵词两个音节同调这一规律仍在起作用，从而肯定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一样也是有声调的，并且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有力地证明，汉语的声调绝不是到中古才产生，更不是所谓由韵尾演变而来的。

第二，是对形声字（或称谐声字）的研究。形声字是研究上古语音的重要根据，因为谐声系列（即形声字系统中）的被谐字和主谐字之间，其声母或韵部往往相同或相近。宋代的学者如吴棫已开始利用形声字考求古音。清代的段玉裁则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著名论断。但谐声系列中的谐声字是分层级的，有的主谐字不能继续作为主谐字来造字，有的主谐字造出的字可以又作为主谐字来造字。本文集卷三 3 篇论文，玉文根据沈兼士先生主编的《广韵声系》做了全面分析，发现谐声层级最多的有六层，如“父”字的谐声系列。他指出，谐声层级则反映出相对的时间层次。也就是说，“谐声字的主谐字反映了历代的语音，而谐声的层级又反映出时间的层次，所以不同层级的谐声字有可能反映历代的语音变化”。从而提炼出“谐声层级求音类法”，即利用谐声系列以研究上古音及其至中古以后的语音变化。同时玉文在深入研究谐声系列的历史层级中，又进一步揭示出谐声系列中的特殊谐声或称例外谐声。因为新造的形声字在其造字时不一定都与同系列的字音同或音近，即其读音有特殊，如利用谐声研究上古韵部，虽然一般是“同谐声者必同部”，但我们都承认有例外。同样利用谐声字来研究声母，也会有例外。因此必须区分正常谐声和特殊谐声。玉文具体分析了 60 个主谐字的特殊谐声，从而说明如不区别特殊谐声，就会得出不可靠的结论，如上古有复辅音说。他认为周秦两汉已经是单声母格局，至于远古汉语或原始汉语是否有复辅音，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是我读了玉文教授这第一本论文集之后的一点体会。此外，我还感受到玉文做学问又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重视语言学理论的学习，一是充分掌握材料。所以他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是值得推崇和学习的。

于蓝旗营寓所

2011 年 12 月 2 日

(代前言)

融古今中外于一炉

——在王力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王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我发言的主题是想从《中国音韵学》(新版改为《汉语音韵学》，以下采用今名)来看王力先生治学坚持吸收“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主张。

王力先生的语言研究，始终坚持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学术精华，他反对把“古”和“今”、“中”和“外”机械地对立起来。他在《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中指出：“有一些新派语言学家们对中国传统语言学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以为旧学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自己在狭窄的范围内钻牛角尖，外国的东西学得不深不透，中国原有的东西知道得更少。有一些旧派语言学家又故步自封，满足于中国原有的成就，即使有所述作，也是陈陈相因，不脱前人的窠臼。这样就不能新旧交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里非常明显地表明了王力先生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追求目标。这种学术追求，在他的第一本语言学著作《汉语音韵学》中就全面地体现了出来。

《汉语音韵学》是王力先生1932年从法国回国以后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音韵学概要的讲义，1936年出版。全书共分四编，编下分章，章下分节。其正文部分，第一编是“前论”，下分三章，依次讲解语音学常识、汉语音韵学的名词和等韵学的情况。该编吸收了国内外语音学包括实验语音学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强调了汉语音韵学研究中“审音”的重要性，并据此梳理了汉语音韵学的一些重要的名词术语，“对等韵学加以说明或矫正”，体现了用现代语音学改造传统音韵学的革新精神；同时对“前人的等韵学作概略的叙述”。第二编是“本论上(广韵研究)”，讲解《广韵》音系及相关研究。对于《广韵》音系，先讨论《广韵》的历史，然后分别讨论声韵母的情况，都是先讨论音类的研究，再讨论音值的构拟，循序渐进，有主有次。这里采纳了古今中外汉语音韵学家的见解，把《广韵》作为“上溯古音，下推今音”的桥梁，

2 上古音丛论

因而在讲解上古音和近现代音之前先谈《广韵》音系；《广韵》各韵的排序及同用独用情况，采用戴震说；音类的划分采用陈澧、张焯、白涤洲、高本汉等人的考证。第三编是“本论中（由广韵上推古音）”，讲解上古音系及其研究。先讨论上古音类的研究，同样做到循序渐进，有主有次，然后梳理清代以前古音学的研究情况，重点分析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章炳麟、黄侃等人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存在的缺陷，正如李方桂先生在《序》中所说，“这差不多是代表一部清代古音学史”。这一部分可以看成是《清代古音学》的雏形。第四编是“本论下（由广韵下推今音）”，依次讨论了《广韵》之后的韵书，现代官话音系、吴音系、闽音系、粤音系、客家话。这里兼顾了语音在时空上的演变，既继承了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讨论音值的构拟，无论是中古音还是上古音部分，王力先生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本汉的构拟体系及其他人的一些构拟成果。关于高本汉的构拟，中古音部分介绍《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构拟。高本汉的这本书用法文写成，1915至1926年分四次出版。王力先生留学法国，学了法文，当然能够较早地吸收高书的研究成果。高书1940年出版了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位先生的合译本。上古音部分介绍《诗经研究》《汉语词族》等论著的构拟。高本汉的这两篇论著都是用英文写的，分别发表于1932年和1934年，前者周祖谟先生有译本，未出版；后者1937年出版了张世禄先生的译本，名为《汉语词类》。

《汉语音韵学》几乎每一章的每一节后面都列有参考资料。参考资料部分，有些参考论著在书后所附的“‘汉语音韵学’参考书”中没有列入。这些参考资料，非常明确地贯彻了王力先生所坚持的“古今中外”的治学主张。例如第一编第一章“语音学常识”各节，先后列有柔迪（Roudet）、房德里耶斯（Vendryes）、赵元任、王力等的相关论述；第二章各节，先后列有《文心雕龙》、《玉篇》、孙愐《唐韵序》、章太炎《国故论衡》、《南史》、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广韵》、黄侃《音略》、江永《音学辨微》、罗常培《中国音韵沿革》讲义、柔迪《普通语音学基础》、李光地《榕村韵书》、刘复《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吴敬恒《国音沿革序》、钱玄同《文字学音篇》、潘耒《类音》、顾炎武《音论》、陈澧《切韵考》、陈寅恪《四声三问》、《元和韵谱》、真空《玉钥匙歌诀》、张成孙《说文韵补》、段玉裁《与江有诰书》、王鸣盛《十七

史商榷》、劳乃宣《等韵一得》、《切韵指掌图》、李汝珍《音鉴》、张麟之《韵镜序》、孙覿《切韵类例序》、莫友芝《韵学源流》、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胡朴安《文字学研究法》等相关论述。外文参考资料都翻译成中文。

书后所附的“‘汉语音韵学’参考书”，也体现了王力先生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学术追求。参考书目所列有古有今，有中有外，外文参考书既有法文，也有英文和德文。参考论著大约 235 种，其中中国古今论著 170 种，外文论著 65 种。外文参考书中，列有丹尼尔·琼斯、帕默尔、斯威特、叶斯泊森、格拉蒙、梅耶等人的论著，光高本汉的论著就列了 12 种之多。

但是，王力先生对于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盲从，而是站在时代的前沿，吸收其科学、有用的部分。不盲从，进行独立的科学探索，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学者必备的素质。他在《汉语音韵学·自序》中说：“近年忝在清华大学音韵讲席，首以玄虚之谈为戒……此篇所述，什九为古今诸贤之说；一得之愚，则存乎取舍之间。”在《例言》中说：“本书正文中之主张力求一贯；虽多采自他人，然既经著者剪裁，亦即代表著者本人之意见。”所谓“取舍”“剪裁”，是指对古今中外的相关成果进行取舍、剪裁，标准是是否科学、有用，而不是按国别来定优劣。《汉语音韵学》中，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是中国的成果，还是外国的成果；是古代的成果，还是现代的成果，王力先生都是取精用弘，常常在肯定既有的成绩的同时，指出其不足。书中介绍了高本汉的上古音和中古音构拟体系，表明王力先生赞同古音构拟，吸收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果。但是他同时指出：高本汉的中古声母构拟是“一个比较可信的假定”，对于高本汉的韵母构拟是“暂用”；关于上古音构拟，高本汉“所定的音值，则有待于修正者甚多……上古音值的研究只由汪荣宝高本汉诸人开端，后人的成绩当更超乎他们之上，这是可断言的”。王力先生还常常在正文部分的注释中点明自己的看法，在参考资料中加上自己的按语表明取舍。

王力先生有着深厚的古典文献和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功底。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参加家乡的赛诗会，开始写旧体诗，一辈子乐此不疲；曾经阅读过十四箱古书。进入清华研究院以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言传身教，使得他国学功底更为深厚。王力先生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语言学家，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老师赵元任先生是美国结构主义语

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王力先生自觉地接受了欧美语言学的熏陶。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研究生毕业以后，又自费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学习语言学理论。当时的法国是继德国之后语言学的中心，以索绪尔、房德里耶斯、梅耶等为代表的法兰西学派当时处于世界语言学的领先地位。那时我国许多语言学家，例如刘复、方光焘、岑麒祥、高名凯等先生，都曾到法国留学。因此王力先生在当时接受的是最先进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教育。因为有这样的学术经历，又有了科学的治学态度，所以王力先生看到了中西学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古代的学术有很多可取之处，因而《汉语音韵学》既不受制于“古”和“中”，也不受制于“今”和“外”，而是上下求索，左右采获，“剟其瑕砾，攀其萧稂”。

王力先生生于清末，成长于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候，我国的学术界有“新派”和“旧派”之分。新派和旧派各有一些学者各执一端，互相排斥，把我国传统的学问和西方的新学简单地对立起来，影响了学术的发展。王力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既不以“新派”来自我标榜，也不以弃绝西学，原汁原味地承袭中学而自居。《汉语音韵学》成为实践这种学术潮流转移的标志性著作之一。

五四运动至今快九十年了。五四以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潮流是中西结合，迄今已经形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人们评价五四时期出现的学术巨星，常常用到“中西合璧”“融会中西”这些词语；当今的中国语言学界，再也没有人排斥西方的学术了。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精华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了，但是贬低甚至排斥中国古代文献的偏差不容忽视。有人主张，现今中国的语言学，不应在古代文献的阅读上花太多的精力，它太难懂了，只要一般能用就行。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把活的语言研究和文献语言研究简单对立起来，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一个至为明显的道理：汉语大量从不间断的文献，本身就是汉语的记录；有些文献，记录了中国古人语言研究的成果。反映历代口语的文献本来就见证了汉语的历史变迁。由于语言的变化，今人不花大力气，就不能弄懂它；没有弄懂它，怎么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呢？贬低甚至排斥古代文献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那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是的，古代文献材料有其局限性，文献考据的方法有其局限性。但是在科学研究上，任何材料都不能包罗万象，任何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研究汉语，特别是研究汉语的历史，我们必须重视古代的文献材料，必须把

文献考据的方法吸收到语言科学中来；历史文献的不足，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加以弥补。

把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跟文献的利用和对中国语言学传统的继承简单地对立起来也是一种偏差。这二者决不是对立的，中国古代的文献和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既可以从一个方面用来印证、检验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又可以用来弥补汉藏诸语言研究的某些不足；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必须跟中国古代文献的科学利用结合起来，必须把对历史比较法的科学运用跟对中国语言学传统的批判继承结合起来。然而，在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中，有的学者对汉语同源词（同族词）、古今词汇的变迁、词义的引申发展等借助中国文献可以加以解决、因而中国古今学者已有相关研究的诸多方面都没有足够的重视。白保罗的汉藏同源词研究正典型地存在着这些毛病。例如白保罗《再论汉—藏语系》说马鞍的“鞍”跟卢舍依语的 kon（“浅谷，山脊”）同源。古代文献告诉我们，汉族人骑马是很晚的事，马鞍的出现更是骑马以后的事，“鞍”这个词不可能来自原始汉藏语。汉语更早的文献，没有发现“鞍”字，其异体字“鞞”最早见于《左传》，那是作地名讲。“鞍”作“马鞍”讲最早见于《管子》。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五《文字孳乳之一斑》中说：“安，诜也，从女在宀下。（乌寒切）孳乳为案，几属，从木，安声。（乌吁切）又孳乳为鞞，马鞍具也，从革，安声。（乌寒切）树达按居室者隐几为安，乘马者据鞞为安也。”这里说得很明白：马鞍的“鞍”来自安定的“安”。“鞍”是汉语内部从“安”滋生出来的一个词。再如该文说“汤”作“肉汤”讲，跟“羹”和“膾”是同源词。古文献表明，“汤”本是“沸水，热水”的意思，隋唐以后才词义转移，指带汁水的菜肴。白保罗、包拟古等人的汉藏比较，他们所列的参考论著中，几乎见不到中国的古书，中国境内现代学者用汉语发布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列得很有限，这可能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有人看到王念孙的“一声之转”不合乎他确定汉藏诸语言同源词的研究，就讽刺王氏的研究为“神话”；看到王力先生结合传统文献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所作的汉语同源词探索跟自己心目中认定的汉藏诸语言的同源词对不上榫，就把王力先生的语言研究划入语文学的范围，这就不能不说是把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跟文献的利用和对中国语言学传统的继承简单地对立起来了。

有些词本来是上古汉语以后产生的词，有些词义本来是上古汉语以

6 上古音丛论

后发展出来的。这从汉语的文献，从汉语同源词、古今词汇的变迁、词义的引申发展等诸多方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有人不顾及这些，而把这些后产生的词、后发展出的词义看作是汉藏诸语言的同源词。他们的理由是，文献滞后于口语，因此文献中某词或某词义出现时代晚，并不说明它在原始汉藏语到汉语文献记录该词或该词义之前的口语中不存在。郭锡良先生《汉语历代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一文从文献资料和语言发展等多方面论证，汉语“书面语同口语自殷周到西汉都是一致的”。所谓书面语同口语一致，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认识：一是书面语反映当时口语的密切程度，即书面语是否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是否有滞后或游离于当时口语的语言现象；二是书面语如果跟当时的口语一致，它是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整个口语的面貌，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保留下来的书面语，是否最大限度地把当时的语音、词汇、语法面貌尽可能地表现了出来。从商周到西汉，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材料，有传世的文献，有地下的出土文献；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是很广泛的。应该说，这些文献资料基本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当时的整个语言全貌。正因为如此，所以历代仿古的文言文，除了使用反映后代生活变化而产生的新的语言成分（主要是词汇）以及谬误的仿古之外，使用先秦到西汉的词汇和语法系统，基本上能比较好地表达其思想内容。当然，先秦到西汉的文献材料毕竟有限，当时语言中的词汇量可以很大，所以不可能把那时语言中的全部词汇（主要是一般词汇）都记录下来。但是，如同郭先生在文章中所分析的，“常用词汇、基本词汇远比一般词汇小得多”。根据语言学理论，一般词汇往往是在常用词汇、基本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当时文献基本上反映了那时的常用词汇、基本词汇。因此，除非有过硬的证据，否则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某一个见于后代文献的词，特别是属于基本词汇、常用词汇中的词，本来在前代的口语中已经出现，只是当时的文献没有记录下来。是的，书面语往往滞后于口语，但是那往往是对新生的语言现象的反映快慢问题，即使是滞后，滞后几千年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例如“硬”最早见于东汉的文献，有人认为这个词是汉藏语同源词。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硬”已见于“原始汉藏语”，那么它从汉藏分化到今天，一直是常用词、基本词，不是在先秦汉语的基础上新生的词。可是先秦到西汉的传世文献却丝毫没有反映；东汉开始，用例骤然出现；东汉以后的文献，“硬”又代代有用例，并且逐步增多。这不是很奇怪吗？说某词原始汉藏语就有，要拿出证据来，不能凭推测。

推测的结果，在两种可能中只任取一种，那是鬼魅。有文献证据，就是犬马。

有人说，白保罗、包拟古等人找出的汉藏语系同源词，尽管人们从文献的角度否定了一些（请注意，这里又承认文献的作用了），但是还有一些没有被人否定，那些还没有被否定的材料必定证明了汉藏语系的假说。这种说法在逻辑上站不住：那些还没有被否定的材料，有可能证明汉藏同源的假说，也有可能证明不了这一假说。怎么能够据此断定那部分“同源词”就一定证明了汉藏同源呢？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李方桂先生批评白保罗时指出：白保罗的汉藏同源研究“那不能称之为方法论，根本不能称其为方法论”，“他的方法论让人误入歧途”；“当我从语言学和方法论的角度去看那本书（引者按：指白保罗的《汉藏语言概论》）时，我认为它不属于学生们应该模仿的著作”；白保罗的做法是钻研词典，把一些词汇抽出来排列在一起，然后根据这些词的相似形式构拟出其原始形式，“我认为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李先生从正面强调确定语言的同源关系、构拟原始形式，在下结论之前必须做好两项基础工作：“如果你想构拟某种东西……你得做更加仔细的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还得对不同的语言作方法上的描写，这是在你作出结论之前必须做到的。”这实际上也是具体指出了白保罗汉藏比较的两大失误：对历史比较法的运用粗疏，对用来比较的不同语言没有作科学的描写研究。《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是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 Bancroft 图书馆的区域口述史办公室在李方桂先生的家人向该机构提出记录李方桂先生自述史的想法后，由区域口述史办公室组织进行的，尽管是“口述史”，但是它必然反映了李方桂先生晚年的真实意见。我们看到，就是白保罗等人这样的一些误说和构拟，却被少数人当作了“圣经”。这时候，重温王力先生《汉语音韵学》等著作，深感王力先生充分吸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学术追求今天仍然有着浓烈的现实意义。

学术潮流具有可变性，当原来的潮流基本上为人们所接受时，它也就变成了传统。五四时期的学术潮流是向西方学习；到了王力先生开展学术活动的时代，学术潮流实现了向吸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转移。当今，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语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王力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开创的吸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学术潮流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取得了丰硕成果，因而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今天的学术新潮，就是

要继承这种优良传统，走中国语言学的自主创新之路。我们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优秀学者不迷信成说，追求真理，结合自身条件，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我们更应该自主创新。不自主就不能创新，唯有自主，我们才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语言学贡献出更多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移植创新的成果。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自主创新的学术新潮正在涌来，愿我们做一个弄潮儿！

参考文献

- 郭锡良：汉语历代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载《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5。
- 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王启龙、邓晓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 鲁国尧：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载《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
- 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
- 杨树达：文字孳乳之一斑，载《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
-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编写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原载《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五辑，商务印书馆，2007。）

目 录

序..... 唐作藩 1

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代前言）..... 1

卷一 上古音构拟问题

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 2

上古汉语词缀构拟析评..... 27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 58

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 87

汉语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证与运用..... 128

附录：汉藏诸语言词汇比较中的词义对应问题..... 142

卷二 联绵词和上古音

先秦联绵词的声调研究..... 162

先秦联绵词的语音研究..... 192

从古代注音材料看“等”和声调在联绵词构词中的制约作用..... 235

从联绵词看庄组的上古拟音..... 245

附录：汉语双音词两音节之间语音异同研究..... 253

卷三 谐声字和上古音

上古汉语特殊谐声中声母出现特殊变化的大致时代的一些例证..... 270

谐声系列与上古音..... 334

谐声层级与上古音..... 368

二等声母的上古音构拟问题..... 384

卷四 秦汉方音

扬雄《方言》折射出的秦汉方音..... 402

后记..... 444

卷

一

上古音构拟问题



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

一 引言

两汉及两汉以前汉语的发展可以这样分期研究：周秦到两汉的汉语，归为上古汉语；殷商甲骨文时代的汉语，归为远古汉语；远古以前的汉语，归为原始汉语。我们治汉语史的学者，必须有鲜明的历史观，不但要区分原始汉语、远古汉语、上古汉语，而且在每一时期内部，也要努力区分每一种语言事实发生变化的时代层次。将来如果证实了汉藏语系这一假说，而且远古汉语的音系也研究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两项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原始汉语。当然，利用汉藏语其他语言古代状况的研究成果研究原始汉语，只能作为其中的一项证据，我们更应该利用原始汉语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材料，去构拟原始汉藏语。上古汉语，如果把西周立国定在大约公元前 11 世纪，到公元 220 年东汉灭亡，大约有 1300 年的历史，语音不可能没有变化。

研究上古声母的直接材料主要有谐声字、联绵词、假借字、异文、声训、汉代的注音等。利用这些材料研究上古声母，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区分它们所反映的时代层次。例如谐声字，上古时期不同时代都会造出一些谐声字。对于一个谐声字，我们应该区分其造字时代和用字时代。“海”从每声，“墨”从黑声。在造字时代，“海”和“黑”都应该属双唇鼻音，但不能证明用字时代它们也是双唇鼻音。道理很明显，试想：现代汉语“海”仍然从每声，“墨”仍然从黑声，我们能说现代汉语的“海”和“黑”是双唇鼻音吗？又如假借字，古代的假借用字常常是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个人写别字。既然古人写假借字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便会作为一种传统传承下来。所以对于假借字，我们应当区分始借时代和沿借时代。在“疲劳”一义上，“罢”通“疲”^①。

^① 参看唐作藩先生：《“同”和“通”》，载《汉语史学习与研究》。按：后来我认为“疲”是“罢”词义引申后另造的分化字。

在始借时代，“罢”和“疲”读音相近，《汉字古音手册》给“罢”拟音为 *bea，给作“疲劳”讲的“罢”和“疲”拟音为 *bia。但是我们不能证明“罢”作“停止”和“疲劳”讲在任何沿借时代都音近。道理也很明显，试想：明代何景明在《述归赋》“豢罢牛而被以文服兮，良马弃而不陈”中还用“罢”为“疲”呢，我们能说明代汉语中“罢”和“疲”韵母相近吗？以上是举例性质的。对于其他直接反映上古声母的材料，我们都应该本着历史主义的原则分析其时代层次，否则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会失真。

从各种材料看，中古有些晓母字和明母字在上古往往相通。例如谐声字：

每 m-：悔晦海 x-
 無 m-：撫撫鯽 x-
 勿 m-：忽惚 x-
 亡 m-：亢孟盲 x-：統 m-^①
 黑 x-：墨默媿縹 m-^②
 威 x-：滅 m-
 灰 x-：朕 m-

m- 是双唇浊鼻音，x- 是舌根清擦音，音值相差甚远。如果在谐声时代，也是一读 m-，一读 x-，就不应该谐声。换句话说，这些字在谐声时代之所以谐声，除了韵母相同或相近外，声母也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建议把这种中古读 x- 的字上古音拟为 m-。于是就应该回答这两个问题：

(1) 把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上古音拟为 m-，根据是什么？m- > x- 的分化条件是什么？

(2) 既然这些晓母字原来读 m-，那么它们什么时候由 m- 变成 x-？

本文尝试运用上面提到的历史主义的原则，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回答，重点回答第二个问题。

① 《广韵》“統”只有呼光切一读，但是《集韵》兼收呼光切和谟郎切。

② 《广韵》“媿”只有乌黠切一读，但是《玉篇》女部：“媿，莫勒切，奴（文按：当作‘怒’）也。”《集韵》亦收入密北切。